



## 用人单位发生变化，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吗？

疫情影响下，很多企业发生合并、分立以及主要负责人、投资人变化的情况。那用人单位发生变化，与农民工签订的劳动合同还有效吗？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吗？

### 1.用人单位合并，对劳动合同有影响吗？

用人单位的合并一般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用人单位与其他法人或组织联合成立新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被合并的用人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一个用人单位被撤销后，将其权利和义务一并转给另一个法人或其他组织。

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后合并的，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由合并后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该劳动合同。

### 2.用人单位分立，对劳动合同有影响吗？

用人单位发生分立是指，在订立劳动合同后，用人单位由一个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裂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由一个用人单位分裂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发生分立的，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  
用人单位分立后，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

### 3.用人单位情况变化，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吗？

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

用人单位的名称只是用人单位的称谓符号，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的变更，也不会导致用人单位的实体发生变化，用人单位仍要继续履行其与农民工已经订立的劳动合同。

整理/制图 甘皙

## 青海建成2600个城乡社区“儿童之家”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记者日前从青海省民政厅获悉，青海通过出台政策、完善措施、落实人员、加大培训等多途径加快“儿童之家”建设进程。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8个州级儿童福利机构、22个县级儿童福利院、38个县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2600个城乡社区“儿童之家”，织牢关爱留守和困境儿童“幸福网”。

“我省利用2-3年时间，在全省所有乡镇、街道办事处设立儿童督导员，在4636个村、社区居委会设立了儿童主任，并全部录入《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管理系统》，实施动态管理。”青海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介绍，从2018年起青海连续三年筹措资金460万元，对所有县级民政部门儿童工作者、乡镇级儿童督导员、村级儿童主任开展拉网式全员培训提升业务素质，为广大儿童打造了一张无形的安全保护网，为“儿童之家”建设及管理奠定基础。

同时，为打通关爱保护儿童“最后一公里”，青海在“儿童之家”开设有“四点半课堂”“未成年人保护驿站”“快乐家园”等活动阵地，鼓励退休教师、青年志愿者等爱心人士义到“儿童之家”组织开展读书、书法、绘画、唱歌、舞蹈等活动，力保城乡留守和困境儿童放学后有地方落脚、有临时学习活动场地。

此外，该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专业社会组织开展为儿童赠送文具图书、家风家教讲座、团队拓展训练、读书分享、心理疏导、安全知识讲座等多种关爱活动，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建立实名制平台、减少工资支付环节……

## 总承包单位收回工资代发权剑指暗箱操作乱象

本报记者 李娜  
本报实习生 何宴彬

9月24日，因为人员工资的一些数据需要核对，詹朝湘电话通知钢筋组的班组长宋丰(化名)到项目办公室沟通。坐在工位上透过一楼窗户，她看到头戴安全帽、身穿安全背心的宋丰大步朝自己的方向走来。作为劳务实名制管理专员，詹朝湘当然清楚，宋丰不是常规意义上的班组长，而是钢筋班组40余名工人的劳务经纪人，转型前也就是业内俗称的包工头。在几乎所有的建筑工程中，不同工种的“宋丰们”一直是项目建设者中微妙的存在。

包工头，一个10多年前明确被政府在行业内取消的身份，正逐步从建筑劳务市场消失并以另外一种身份存在。他们手中攥着紧俏的工人队伍，工程单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他们，但也同样在多方面心存戒备。随着实名制平台建立、总承包单位收回工资代发权，由包工头带来的克扣、拖欠工资等乱象减少，用工逐渐规范。

### 工程方组织工人存在一定难度

“越过劳务经纪人，真的就招不到工人吗？”

“能，但远远不够。”面对记者的提问，詹朝湘的回答斩钉截铁。

詹朝湘目前所在的中建四局三公司首开景泰项目，采用的是小班组管理模式，农民工人数多、流动量大，因为工作需要，她和班组长之间打交道频繁。今年初疫情期间项目复工过程中，她也亲眼

### 阅读提示

实名制平台建立、总承包单位收回直接的工资代发权，让建筑劳务市场克扣工资等乱象减少，用工更加规范。随着改革的深入，业内人士认为，以劳务企业综合分包为主的传统用工模式将走向以施工作业企业单纯提供合格劳动力资源为主的新型用工模式。此外，总承包企业将向工业化生产转型，建立自有技工队伍，从而打破劳务外包比例较高的现状。

目睹了在组织工友们归队时劳务经纪人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尽管我们派出了车到工人所在地去接，但也可以说是他们组织回来的”。

随着规范建筑劳务市场的政策逐步出台，包工头的用工形式被杜绝了，以前的包工头纷纷转型以劳务经纪人的身份组织工人与工程方对接。

詹朝湘称，当前绝大多数劳务公司名下只有少量的管理者，没有稳定的工人队伍，“没有劳务经纪人的話，现阶段组织工人有一定的难度”。

建筑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工人作为支撑。由于建筑行业技术含量低、门槛低，分散灵活的建筑工人需要劳务经纪人作为纽带连接上工程方。在中建科工西部大区任安全总监的高成子，有着10余年的工程单位从业经历。他告诉记者：“过去的包工头、现在的劳务经纪人，手握工程资源和人力资源，无论对于总承包企业还是农民工而言都掌握着话语权。”

“农民工班组通常有着极强的地域性，包工头一般是团队中最初的务工组织者，威信高、影响力大，班组成员对其有着较强的身份和情感认同。”高成子认为，也正是因为这样，尽管作为又一层赚差价的中间商，包工头即

现在的劳务经纪人的存在无疑会提高用工成本，但至少在当前，仍是工程建设中很微妙的存在。

### 劳务经纪人手中筹码越来越少

詹朝湘目前所在的项目一共与10个劳务公司同时合作，每个月都要与不同工种的劳务班组长进行工资的最终核算，之后再将他们提交的工资表在项目上公示。这样的管理模式曾因透明度高而遭到劳务经纪人的不满与抵制，不过改革的大势已然不可逆转。

去年以来，全国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可以实时记录农民工进出工地、考勤、工资支付等信息，发生劳资纠纷时，这些信息可作为真凭实据帮助农民工维权；通过平台可以建立工资专户，实行银行代发工资制，防止发生欠薪；此外平台还能显示农民工技能水平等信息，相当于为其制作电子简历，有助于流动频繁的农民工找到合适的工作。

“实名制用工改革后，很多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中建三局北改之星中际广场项目经理吉声宝告诉记者，过去进场工人干了多少活、干了多长时间、工人工资占比多少，

工程方不掌握，只有劳务经纪人心里清楚，因此劳务经纪人对上对下都具有很高的裁量权。实名制信息化管理后，多少工人进场、工作时长都有明确记录，再通过对产值对工资进行核算，工资克扣等乱象没有了暗箱操作的空间。

此外，在采访过程中，工程方单位的相关负责人都提到了5月1日正式实施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其中明确规定了“工程建设领域推行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委托施工总承包单位代发制度”。针对工程建设领域工资支付要经过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包工头等多个环节，容易被截留、克扣的问题，施工总承包单位通过专用账户直接将工资发到农民工本人的银行账户，工资支付环节减少。这样的规定虽然加大了总承包单位的管理压力，但却是一项对劳务经纪人强有力的限制举措，他们手中的筹码越来越少了。”吉声宝说。

### 总承包单位向建立自有技工队伍转型

尽管劳务经纪人的实力与势头锐减，但短期内，工程方在建筑市场的用工仍无法完全摆脱他们的制约。

中建科工四川分公司副总经理王博在基层项目摸爬滚打10余年。在他看来，包工头的角色在建筑领域消失或被取代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农民工群体真正转型为产业工人，就业不再是群体组织化的行为，而是自主选择；另一种则是包工头、劳务经纪人成长为规范的劳务公司或是进入劳务公司成为人力资源的管理者。

“目前市场上只有极少数从早期包工头升级转型为合法规范的劳务公司。”詹朝湘告诉记者，她所在的项目今年以来最高峰时用工量在400人左右，其中由劳务经纪人带队进场的情况仍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根据她所了解的情况，在合作的10家劳务公司中，仅有1家是真正从包工头起步、历经10余年时间发展成劳务公司的。

不过，对于当前建筑市场的劳务用工走向，王博仍持乐观态度。他认为，随着建筑业步入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一方面以劳务企业综合分包为主的传统用工模式将逐步退出舞台，走向以施工作业企业单纯提供合格劳动力资源为主的新型用工模式。此外，装配式建筑体系的兴起，也将促使总承包单位向工业化生产转型，建立自有技工队伍，从而打破劳务外包比例较高的现状。

“为了避免劳资纠纷和结算争议，目前我们正在推进精细化劳务发包计价模式，将劳务队伍利润明晰化，这样对企业精细化管理和项目质量安全管理都十分有利。”王博称，尽管在用工制度改革的过渡时期，劳务企业、施工队和班组承担总承包企业施工作业主体任务的地位不会改变，但这些新举措、新路径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劳务用工朝着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龙山街道一工地上，建筑工人头顶烈日进行施工。

谭云伟 摄/视觉中国



## 新疆南疆四地州有组织转移就业29.2万人

# 转移就业点亮精彩人生

本报记者 吴峰思  
本报通讯员 任红芳 胡潇潇

身边人，让那些没有出去过的村民心生向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带动更多人通过就业过上好日子。”阿依木萨说。今年因为表现突出，阿依木萨被评为阿克苏地区劳动模范。

努尔加玛丽·吐热克是阿依木萨的邻居，看到阿依木萨到企业工作后给家里添置了新电器，人也变得自信了，对此羡慕不已。“去年7月，阿依木萨回村里时给我讲了很多城里事情，并邀请我到她上班的企业看看，去了之后我就留下来上班了。”努尔加玛丽说，能赚钱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她非常满足。

今年，新疆启动实施“南疆三地州10个未摘帽深度贫困地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有组织转移就业工作”，从东疆、北疆调剂了5.1万个就业岗位，专门用于安排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贫困劳

动力稳定就业。

和阿依木萨一样通过转移就业实现致富梦的还有布威麦热姆·阿不都热依木。布威麦热姆是和田策勒县阿热勒村农民，原先在家务农，家里3亩地年收入不足4000元，她的丈夫在乡上开了一家台球室，收入不稳定。

2018年3月，布威麦热姆来到离家不远的一家服装厂上班，起初月收入不足1000元，通过自己努力奋斗，布威麦热姆从小组长成长为负责这家服装厂的厂长，月收入也达到了3300元。“以前家里收入低，什么花销都靠老公，挣的钱一家三口不够用，现在我们收入高了，生活条件是一天比一天好，多亏了现在的好政策。”布威麦热姆说。

据新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新疆南疆四地州有组织转移就业29.2万人。许多贫困户走上了就业脱贫

之路。新疆还鼓励通过发展旅游产业带动就业，包括3年10万人计划等，千方百计推进贫困劳动力增收实现脱贫。

和田好学郎服装有限公司设立在洛浦县多鲁乡阔台买村的服装扶贫工厂生产车间内，工人脚踩着缝纫机踏板，手中的布料在针板上移动，他们正为完成出口订单忙碌着。前不久，工厂刚刚签订了一批订单，为了保证按期完成加工任务，工厂采取件计工资、按劳计酬的方式，鼓励工人积极生产、多劳多得。

村民布合力且木·阿不都热依木是第一批进入扶贫工厂的员工，她告诉记者：“我刚来的时候有3个月的培训期，每天可以领到30元的生活费。现在，技术越来越熟练，已经是这里的班组长了。厂子设在家门口，我不仅每月有35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兼顾家庭，全家人都很高兴。”